

完话，斋务股一位先生宣布：“学生宿舍三人一间，大家自由组合，到我这里来领钥匙。”

我与张士奇、赵世昌三人组合，领了新斋218号的钥匙。进入宿舍，看到窗明几净，十分整洁幽静。房间里有三张单人床，三张小桌，还有一间储藏室供我们放置杂物，我们都十分满意和高兴。放下行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看富丽堂皇、庄严肃穆的大礼堂，以及宽大明亮的图书馆，宏伟的建筑、优越的条件让我们觉得十分幸福。我们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才不辜负学校和祖国对我们的希望。

1946年10月10日，在大礼堂，梅贻琦

校长主持了新学年的开学仪式。在这之后的三年学习生活中，在各位严师的教导下，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理工的实践经验，终生受益匪浅。

我在新斋218号住了3年，对此屋感情深厚，每次返校都要找机会再去看看，会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默默回忆在这里度过的三年幸福、愉快的生活。今天，我们都到了耄耋之年，2009年筹备机械系1949级毕业60周年纪念会时，通过多方联系，只找到十几个人。4月27日开会那天，实际到会的除我之外只有林宗棠、吴明昌、李有章三人，其他人或在外地，或年老体弱行动不便，都未能参加，不禁使人感叹时光易逝，生命短暂！

2010年9月10日

缅怀联大的学习与从军岁月

○王忠诗（1944地质）

我小时在菲律宾接受中小学教育，深受美国现代文化的熏陶，但也遭到严重的种族歧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陷，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从此我心中萌生对日寇的仇恨。自“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各地华侨和社团同胞同仇敌忾，菲律宾华侨得天独厚，可以公开宣传活动，报导国内战况；各界华侨随即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组织，统筹筹募抗敌捐款、宣传抗日活动和资助一些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尤其店员工会、侨校学生一直站在最前列，我作为一个侨生，每日都为抗敌后援工作尽力。

1940年初夏我高中毕业，我心中多么



王忠诗学长

希望回国参战或升读大学。但是祖国半壁河山已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它到处奸淫烧

□ 联大春秋

杀，民众生灵涂炭，尤其东南沿海一带侨乡的乡亲在想尽方法逃往国外避难；我的父兄们焉肯让我回到烽火连天的地方去？无奈中我偷偷联络马尼拉各侨校毕业同学三十多人，经过几个月的秘密筹划，积蓄金钱，购买生活日常用品，最后放弃了当地居留权，神不知鬼不觉地由马尼拉乘船途经香港、越南海防和河内，前后十余天才到达昆明。在全国大学统一招生日子参加入学考试，我幸运地考入第一志愿——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

与此同时，法国已被德国法西斯灭亡；越南的法国殖民统治者六神无主，日寇乘机以训练海军为名登陆越南海防等地，耀武扬威，我国西南边防再次受到威胁，于是国民政府第三次命令西南联大迁四川。三校校务委员会无法抗拒上级迁校命令，只好牺牲1940年秋季入学学生，命令我们自找交通工具，按时到四川南部叙永县报到上课。当时后方没有民用公共汽车，更不用说经三省的长途汽车。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南，人生地不熟，只好去昆明货运站找私人运柴油去重庆的卡车，以俗称“黄鱼”身份和司机讲好价线，带着行李爬上满装53加仑油桶车上。我有时坐在油桶上，有时卧倒，从昆明出发，货车似乌龟般颠簸爬行，穿越“云贵高原”三省。最怕的是途中车子出毛病，停车检修换零件，有人教我要准备一些香烟，车子一停立即小心将香烟给司机奉上，小心提防半路被司机甩下。

车子走走停停用了八天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叙永。叙永这个川南偏远的小县，贫困而荒凉，没有日用品供应，倒是有不少菜馆和茶馆，教室和宿舍是借用寺

庙，没有电力供应，每个学生自备一盏小小煤油或菜油灯作夜间自修用。微弱的灯火，一阵风吹过灯火熄了，只好躺在旁边的双格木板床睡觉。我的下铺是位大嗓门的河北同学杨桂田，他一说话整个城隍庙大殿的同学都能听到，特别有趣。不少同学来自平津沦陷区，和家中断绝了通信，更不要说经济的支持。学校每月给贷金八元钱，供学生伙食费，大家就是在这种困境中得到锻炼，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有书念已是难能可贵了！

在战前，不论清华或北大都有地质系，是我国最早设置的地质学科，师资都是留学欧美回来的名教授，清华北大的地质系合并后，更是如虎添翼，师资图书设备更加齐全充裕，力量成倍增长，得益者是我们学生，我们是何等荣幸呀！

学校派来叙永教授大一“普通地质学”的是原清华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教授。他1920年硕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在美又兼修天文、测量、考古等学科，学问渊博，讲课时涉及学科非常广泛，使我们对陌生的地质学渐入佳境，产生了兴趣。他课余关心我们的生活，请我们到他家中，了解我们的思想动向。他知道我们几乎全部来自沦陷区，远离家庭，生活困难。不过袁老师家庭可能比我们更困难，他一家大小七八口，经过三次搬迁，其困难可想而知。他对我们1944级同学的关怀始终如一，以我为例，他为我介绍了女朋友，1950年又要我去清华地质系当助教，他给我们全班同学的温暖，我们毕生不忘。

1941年初秋，我们又按照1940年自昆明来叙永的路线，几经周折回到昆明升读

大学二年级、三年级课程，可是这二年又有非常大的变化。一是地质系有专业教授十位左右，他们德高望重，不但国内其他大学地质系所没有，恐怕西方也少有。而助教方面就更了不起，有近二十位，这些精英在抗战胜利后成为清华、北大地质系，以及后来分出来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台柱。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随即侵占香港、越南、缅甸和印度东部，企图使我国再没有连接国外的通道，此事对我校全体师生影响极大。日寇空军驻扎在越南河内，每日派机轰炸昆明等地，使我校的教学及生活秩序全被打乱。上课时间只好安排在上午9时之前、下午4时之后。中间数小时，师生要跑到市郊躲避日寇的空袭，学生每日只能有两餐饭了。这时，师生生活更加困苦，大部分学生晚间须外出找些半工半读工作以补贴开支。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日至香港沦陷的短短几日，在香港有大批国内知名民主人士急需撤回国内，但国民政府非常有限的几架飞机，不是去拯救这些精英人士逃出敌人虎口，而是忙于运输他们的皇亲国戚和他们的国际名牌生活用品与狗，学生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在昆明发起游行抗议，喊出“拥护龙(云)主席，打倒孔祥熙！”这一学生运动，为日后全国学生运动播下种子。

1944年2月，我们正准备按学校要求去野外收集地质矿产资料编写毕业论文，学校突然宣布：抗战已到最紧急关头，国家急需大批英语翻译派到各战区，配合盟军联合作战；政府决定征召西南联大1944年毕业班全体男生到军中当英语翻译。

经过短短十多天的军训和军用英语培

训后，我和二十多个同学被送到昆明机场，我心中没有任何私念，也没有任何人来送行，我们已知道要去印度—缅甸战区，那里的中美英联军已准备就绪，目标是消灭在缅甸的日寇，打通中印公路，修建一条由印度到昆明的输油管，将石油输到中国。我们还知道送我们出国的飞机，回来运的是宝贵的军火，只有军火能挽救国家免于灭亡。我们决心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而死在异国他乡，我们不是怕死鬼，也不是胆小鬼！

云南西部地处横断山脉，高山深谷南北向平行排到，飞机起飞后不久，不断升高再被拉低，如此反复几次后大家已呕吐不止，最后都吐出了胆汁。而为了避开日寇在缅北的高射炮火，飞机必须转向西北方向越过西藏南部的“驼峰”。当飞机在印度阿萨姆邦汀江机场降落后，我已经瘫在机仓地上，由美国兵将我抬到一个丛林中休息，这是我们从军后第一个考验。不知什么时候，由一辆大卡车送我们到了中国驻印远征军在印度列多前线基地的美国48野战医院，安排我们在医院当翻译。医院科室齐全，设备是最新的，医官技术一流，专门接收、医治前线的伤兵。我们工作、生活安定，因为离缅北前线较远，经常还有美国派来歌星慰问和电影演出。但是一间野战医院安排20多个翻译，实属多余，而前线数十万战士在浴血抗战，急需增加翻译。为此，我和地质系同班同学陈鑫、欧大澄，历史系卢少枕，向军委外事局驻列多办事处黎主任要求去缅甸前线。我们的请求立即得到了他的首肯，我被改派到驻印军新六军新30师88团第三营，配合美军联络官在密支那最前线对敌寇作

□ 联大春秋

战。

密支那是缅北战略重镇，我军反攻前日寇已在那儿，利用当地森林资源建成数层坚固工事，储备大量军火、粮食，作长期和我军决战的准备。虽然该地机场已被我军占领多时，但城池屡攻不下。日军派遣狙击手，在夜幕掩护下常三五成群对我后方团部、师部偷袭，扰乱我军心。雨季来临时，白天黑夜下个不停，我们蹲在战壕中下半身经常泡在水中，而当地的蚊子、蚂蝗（水蛭）传染恶性疟疾，对我们威胁很大。但我军有美军炮兵、空军配合作战，加上美国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可强攻敌人坚固的工事，炮兵、空军用地毯式的密集攻击，终于收复密支那。大军又挥军南下，直攻第二个目标——八莫，很快歼灭日寇守军。至此，我30师完成战斗任务，转至中缅分界瑞丽一带休整。

1945年1月28日，由孙立人将军率领的我驻印缅远征军新一军，和由卫立煌将军率领的滇西远征军，在芒友举行胜利会师典礼，会场上全体官兵无比兴奋，热烈欢呼。尤其印缅远征军两次入缅，经过两年八个月艰苦卓绝的对日作战，两军终于将日寇王牌师团全歼于怒江、松山、腾冲、龙陵、南坎和密支那，使中国军队扬眉吐气。此时中印公路开通，中国政府宣布，为表彰史迪威将军的彪炳战功，将该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全线1736公里。同时兴建的由印度加尔各答到昆明的输油管道也同时全线开通，官兵们无不热泪盈眶，这胜利是无数官兵用鲜血换来的！

当日下午，中美两国国旗飘扬在畹町空中，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先生由重庆专程来畹町参加典礼。军方事先在印度利多准

备满载军火、汽油、大炮等军用物资的120辆大小汽车组成车队，浩浩荡荡地由中印公路驶来，这支车队是由输油管道的领导者、建设者美国皮克少将率领。皮克少将自1943年10月在利多起，一直紧跟在新一军后面，军队打到哪里，公路和油管就修到哪里，他们和军队官兵一样劳苦功高。

最值得纪念的是贵阳之夜。新30师全体官兵在昆明郊区休整多时，1945年8月中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委会外事局命令，要我立即去湘西芷江前线指挥部报到。湘西当时是华中对日寇作战的另一个战区，我8月15日午后抵达贵阳，住在兵站要过一夜。那是一个很热的午后，好像要下大雨，但又下不来，感到特别烦闷，我孤身一人躺在床上发呆。如今调我一个人去湘西，虽然没有考虑生死，但脑中总被孤单围绕，因此辗转床第睡不着。突然间，就听到远处有鞭炮声，声音越来越远，兵站站长推门进来喊道：“你还在睡大觉呀？日子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我冲上大街一看，只见美国大兵端着冲锋枪朝天开火，庆祝胜利，还向我喊道：“我们可以回家了！”这句话对他们是最大的鼓舞和安慰，对我们来说是国耻终于洗雪了！

第二天，我赶到芷江前线，眼看到上上下下还沉醉在说不清的迷茫中，胜利会来得这样快和突然吗？他们很快将证明我在军中服务完毕的文件交给我，我再到昆明的军委外事局转一份“该员已完成军中服务任务，特此证明”文件，最后交给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此后，我领到了联大三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签名的毕业证书。

2010年8月15日于香港